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五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二年一月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1)
“万木草堂”回忆	梁启勋(62)
简述“哈佛燕京学社”	聂崇岐(70)
桐油买办商义瑞行的经营始末	李景文(81)
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	徐国懋(134)
奉张时期和日伪时期的东北兵工厂	陈修和(150)
云南空军始末	张汝汉(166)
我与广东空军	丁纪徐(193)
我所知道的孔祥熙	谭 光(213)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	(235)

附注

对《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六〇页

对《“万木草堂”回忆》一文的质疑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二六页

对《云南空军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六〇页

对《我所知道的孔祥熙》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七二页

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关于旧大公报的历史，我們曾經将自从英斂之于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創刊这个报，到王郅隆及其后人手里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停刊的一段，統称为“英斂之时期的旧大公报”，作为前段整理过了。現在繼續談的是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營时期的旧大公报。这是后段。这一段历史，是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續刊，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于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共約二十三年的历史。

1926—1949

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鸞三人經營的新記公司大公报，是从安福系財閥王郅隆的后人手中购买过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天津原址（日本租界四面钟对过，現和平路二四一号）續刊，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这个报归人民所有，旧大公报的历史从此結束。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年代，它包括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大革命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四个重要时期。这不太长的二十三年，在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鸦片战争起，斗争了一百多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这一时期才涌起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以至取得一九四九年的大解放。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强大到担任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长大起来，能够在政治上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了。这二十三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恰恰记载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统治集团由叛变大革命篡夺国家统治权到最后崩溃，同时记载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经过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中小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反复斗争，以至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这是中国两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即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所领导的力量们的斗争。同时也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所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① 蒋介石集团对内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外依靠国际帝国主义，所以它的斗争如果成功，中国必然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中国。中国人民革命，交叉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是经常进行着的；但是，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阶级矛盾就呈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以至形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革命的统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版第一〇四八页。

一戰綫，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還曾經先後兩次把蔣介石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組織在統一戰綫之內，蔣介石也先後兩次叛變了革命。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是在同中國資產階級的複雜關聯中走過來的。這是一個歷史的特點。這一時期的舊大公報是官僚資本企業，主持者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個人都是大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報紙既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就必然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這一時期的這個報，立場明確，始終是為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由於中國革命走着一條曲折複雜的道路，這一時期的舊大公報也就如影隨形地反映着中國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中國革命的一種曲折複雜的形態。而總的方向是：蔣介石依靠美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反人民，舊大公報擁護蔣介石，直到蔣政權的滅亡。

這大致可以畫成如下的一幅曲綫圖：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新記公司大公報續刊之初，正当北伐軍逼近武漢，大革命達到高潮，這個報就反映出資產階級對於大革命的恐懼。它怕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持，怕工農學生的群眾運動的興起，一句話是怕“赤化”。它要蔣介石表明究竟是“赤化”還是“非赤化”的政策態度。頂到蔣介石叛變了大革命，民族統一戰綫破裂了，大公報不怕了，吳鼎昌這個大官僚大銀行家就千方百計地向蔣介石統治集團里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蔣介石不抵抗失掉東北三省。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根源於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綫。全國人民憤怒地要求蔣介石抗日，蔣介石利用大公報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辯護，又把吳鼎昌拉進他的所謂“國防設計委員會”，以為“準備抗戰”的點綴，實際却在全力進行所謂“攘外必先安

內”的反共內战。以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轉机，蒋介石被迫承諾了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思想进入了国民党統治区，大公报只是抱着热烈拥蒋統一的心情，并未認真領会或宣传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民主、团結、进步的精神。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以至“八一三”淞沪抗战起来，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成为主要矛盾，大公报才打出“拥护抗战”的旗帜。蒋介石的抗战原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从一九三七年起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謀和活动始終沒有停止，张季鸞就部分地参加了这种活动。在八年抗战中，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进行了一些“小罵”，对于蒋介石“統一軍令政令”的叫囂和几次反共阴謀进行了“大帮忙”。因为大公报对蒋政府“帮忙”有功，在抗日战争将近胜利的时候，胡政之向蒋介石敲了二十万美元官价外汇的竹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际和国内的阶级关系都起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結，表面上摆出一种和平姿态，实际上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內战。这时候，胡政之以所謂“社会賢达”^①的身分参加了旧政协和所謂“第三方面”，周旋于国共之間；大公报也維持着“第三方面”的姿态。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正式揭开反共反人民的內战之幕，是蒋介石的再一次叛变。胡政之到南京签名报到参加了伪国大，“第三方面”破产了；大公报的领导层在这时已經看出蒋介石的失敗的命运，而由于它的阶级的規律，大公报也就撕掉了所謂“独立”、“自由”、“第三者”等等的紗幕，走着崇美随蒋的末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

① “社会賢达”这个名詞，是由政学系头子张群創造出来的，是指参加旧政协的无党派人士，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等都被称为“社会賢达”。

放战争一天天地胜利，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天天地失败，美帝国主义也知道蒋介石的大势已去，难于挽救了；但为了最后保留它的中国半殖民地，还寄幻想于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这时候，所谓“第三条道路”喧腾起来，一些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或多或少带有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他们没落阶级的挣扎中仰望着美帝国主义的“青睐”。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重视大公报，因而也把胡政之作为网罗的对象。胡政之的看法比美帝国主义真切些，他判断蒋政权终将灭亡，所以他于一九四八年三月恢复了大公报香港版，在此以前，他还在美国出版了一个《大公报纽约双周》^①，这是他为他自己和大公报准备的退路，准备在中国解放之后流亡海外以至到美国去办“白华”大公报。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报馆的老板胡政之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即上海解放前一个月死去了，大公报即在上海解放之后结束了它为中国反动的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历史，归人民所有，获得了光荣的新生。

吳胡張三人

吳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同出身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同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们三人少年时在日本同学，后来共同经营新记公司大公报。旧大公报前后共有四十七年的历史，吳胡张经营的一段约二十三年，约占旧大公报历史的一半，而其重要性却远远超过前段。这是因为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段历史时期重要了，也因为旧大公报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所代表

^① 这个《大公报纽约双周》的内容，是把每两周内的大公报的重要社评译成英文发表，由于时局变化，发行不久即停刊。

的階級性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有着曲折复杂的关系，这个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发生了或多或少或浅或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旧大公报的資本很单纯，主要是吳鼎昌的五萬元，这是官僚資本。吳鼎昌的資本，胡政之的組織，張季鸞的文章，这是构成新記公司大公报的三要素。这里先談吳胡張三人的略史。

吳鼎昌

吳鼎昌，字达詮，笔名前溪，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華陽。吳原籍浙江吳興。吳家世代当“師爷”，他的父亲吳贊廷在四川綏定府署作幕十七年之久，退休后即定居成都作寓公，在成都置有田宅。吳鼎昌出身于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少年进学为華陽縣秀才，入成都客籍學堂讀書，获得四川官費留学日本。先在日本東京預備學堂修业，后毕业于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吳工于心計，矢志作官，在日本留学时，正当辛亥前革命高潮时期，他挂名为同盟會員，并不革命，一般同学在課余時間从事政治活动或娱乐，他却閉門練写小楷，准备回国考洋翰林。回国应廷試，果然得中翰林院檢討。經其族伯山西藩台吳匡濤举荐給东三省總督錫良，先任东三省總督署度支、交涉兩司顧問，后派充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礦務局總办。后来又以大清銀行總監督叶景葵的关系，被任为大清銀行總務局局長，轉任大清銀行江西省分行監督。辛亥革命时，吳逃出江西，适成立大清銀行清理处，吳参与了接收上海大清銀行的事务，又参与了中國銀行的筹备事务。吳先与研究系拉上关系，一九一三年熊希齡組閣，梁启超为币制局總裁，任吳为造币厂監督。吳又与梁士詒拉上关系，梁为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將吳引見袁世凱，袁未予重用，只給一个參議的空名。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搞洪宪帝制，任吳为

农商次长，未就任。一九一七年张勋搞复辟运动，河南督军张镇芳附逆，复辟事平，张镇芳连带垮台。盐业银行系张镇芳所创办，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与张镇芳有联系，张在政治上垮了台，恐影响他的银行，请吴出来顶名担当盐业银行的事务；吴这时已与安福系发生关系，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遂令吴鼎昌接收盐业银行，他从此担任了盐业银行的总经理。一九一八年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约吴任财政次长，吴允为次长，但要求兼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吴两度任造币厂厂长，共七、八年之久。因造币厂向日本购铜，得回佣；铸造银元的成色检验标准有伸缩，譬如国际标准为百分之八十八，得有千分之三的上下，北洋政府的标准为百分之九十，但含银至百分之八十的银元就敲得响了，吴因此发了财。吴在财政次长任内，适逢上海焚毁鸦片大舞弊案，财政部受贿八十万元。曹汝霖兼任总长，部务俱由吴鼎昌处理，这笔贿款，曹未分润，由吴独得^①。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吴为北方分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吴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愿和，吴为代表，参与谋议，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议无成。一九二二年，吴鼎昌发起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创办“四行储蓄会”，并设“四行准备库”，为中南银行取得钞票发行权。四行储蓄会的领导机构由四人组成，即盐业代表吴鼎昌、金城代表周作民、中南代表胡笔江、大陆代表谈丹崖，推吴为主任，就此形成所谓“北四行”的集团。一九二六年吴鼎昌投资五万元，与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天津大公报，吴为社长。

在此以前，吴鼎昌曾经对人说，他准备办三件事：（一）开一个

^① 据章士钊委员对作者说，这件事是吴鼎昌亲自告诉他的。

報館。他說一般的報館辦不好，主要因為資本不足，濫拉政治關係，拿津貼，政局一有波動，報就垮了。他計劃拿五萬元開一個報館，準備賠光，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請一位總經理和一位總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預備好這兩個人的三年薪水，叫他們不兼其他職務，不拿其他的錢。一九二六年他接辦大公报，就是一次拿出五萬元，以胡政之為總經理，張季鸞為總編輯，每人月薪三百元，相約專心辦報，不兼他職。新記公司大公报就這樣辦了二十多年，直到中國解放。（二）辦一個儲蓄會，以抵制外國人辦的儲蓄會。這就是四行儲蓄會。這件事是成功的，四行儲蓄會吸收存款最多時逾一億元。外國人辦的萬國儲蓄會和中法儲蓄會被四行儲蓄會擠垮了。（三）設一個國際大旅社，免得外國人來到中國都住洋飯店。這就是四行投資的上海國際飯店。这三件事他都做了，特別是大大公报使他得到鑽進蔣介石集團的一份政治資本。

吳鼎昌是個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政客，一生做官，一直到死。他從束著小辮子讀書的時候就想做官，得秀才，留學日本，考洋翰林，走他族伯的門徑開始做官；他通過葉景葵的門徑鑽進大清銀行；鑽進研究系的關係，因此抓到造幣廠這個肥缺，嘗到“升官發財”的滋味。他是個條陳專家，由清末到民初，他不斷地給大官上條陳，以兜售他的心計，博得梁士詒的賞識。梁士詒把他引見袁世凱，袁世凱相他“背後見腮”，不予重用，只給了個參議。吳自己曾說他吃了相貌的虧。其實，袁世凱當時嫌他曾經掛名為同盟會員，經過考察，其人並不革命，所以到洪憲帝制時袁世凱對人說：“現在可以用他了。”給吳鼎昌一個農商次長，吳一嫌這個官不大，也看到袁皇帝的風頭不順，未曾下水。接下來，他從研究系鑽進了安福系，由此抓到了鹽業銀行，成為銀行界的重要人物；由此做了財政

次长再兼造币厂长，真正发了财。吳鼎昌的钻进安福系，也还靠了他的賭博本領。他同安福系一些头子倪嗣冲、吳光新等一起打牌，混得很亲热。吳能計算，善于賭博，很贏了一些錢，他在北戴河的一所別墅就是打牌贏来的。到一九二六年，在他投資接办大公报的前夕，安福系倒了，整个的北洋軍閥也就要土崩瓦解了。在这时候，这个热心做官的吳鼎昌什么官都沒有了，只剩下一个盐业銀行總經理作他的基础。这时候，南方的新兴势力起来了，划时代的大革命开始了，北伐也就要出师了。吳鼎昌是善观气象的，他观察到他所立足的北洋軍閥集团的气数尽了，必須面向南方，另靠新主。这时他的留日同学胡政之正在搞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这两个新聞出版企业都不得劲，經濟困难，吳鼎昌每月津貼国聞周报三、四百元，以資維持。吳鼎昌經常以“前溪”的笔名在国聞周报上发表文章，借以买得一个“經濟专家”的名气。当然，那时每周只发行几千份的国聞周报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时适逢张季鸞失业在天津閑居，吳鼎昌在天津当他的盐业銀行總經理，胡政之在王郅隆的旧大公报关門后，在北京办国聞通信社，也常来天津走走。这三个当年的留日同学，又在日本租界相会，看着双門紧閉的大公报館，就动了接办大公报的念头。张季鸞正无事可干，技痒难熬；胡政之的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都病懨懨地沒有起色，对在自己手上办垮了的旧大公报也不甘心；吳鼎昌原有拿五万块钱办报的計劃，这时正在无官寡居，大为寂寞，也願意借胡张两个熟手办起一张报来，作为自己再挤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資本，于是一談就“三人同心”了。吳鼎昌拿出五万元，由胡政之从王郅隆的儿子王景珩的手上盘购了旧大公报館，以胡政之的班底（国聞通信社和国聞周报的干部以及旧大公报的职工），加上张季鸞的一支笔，組成

了新記公司大公报，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續刊。

新記公司旧大公报續刊之日，正值北伐軍与吳佩孚軍大战于汀泗桥，武汉搖搖欲墜。吳鼎昌这个拥有資財的投机政客，身在將傾的北方旧巢，面向陌生的汹涌而起的南方新兴势力，心旌懸懸，不知如何对待。他采取了积极态度，因为有大公报这个武器在手，他就活跃地利用起来。新記公司旧大公报九月一日續刊，九月二日的报上就发表吳鼎昌写的署名“前溪”的题为《战卜》的論評。这篇文章是吳鼎昌的問路石，对南北两方且不作左右袒，只表示象似厌战的意思。随后看出革命营垒里有裂縫可寻，更由于他自己的階級性的指使，他就接連着写《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注意两大潜势力之暴发》等篇社評，向讀者指点北伐軍有“赤俄为之扶持，有青年为之宣传，国际势力之竞争”等等，从而挑拨“赤化”与“反赤化”之国际关系。等到看定了形势，蔣介石确有叛变革命的迹象了，他就在九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三十六期国聞周报上发表署名“前溪”的社論，题目是《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蔣介石宣明态度》，儼然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資产階級要蔣介石表明他的政策是“赤化”还是“非赤化”。也就是要蔣介石表明他是忠实于与工农群众結成統一战綫的大革命呢，还是象旧軍閥一样繼續作城市买办資产階級和乡村豪紳地主階級的代理人？蔣介石果然叛变了大革命，大举屠杀工农人民，成为效忠于大地主大資产階級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新軍閥。一場惊天动地的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叛徒蔣介石所篡夺，建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階級的反动政权。吳鼎昌这个官僚資产階級政客自然是霽然色喜，弹冠相庆，又“可以出而仕矣”。怎么钻进蔣介石的营垒，自然还要靠大公报这个武器。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在国聞周报上发表《中国新經濟政策》一篇专文，并且印了单行本，

分寄各方，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經濟学者”，以搔首弄姿，插标卖身。頂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民族危机严重了，吳鼎昌搞政治活动的机会来了。他抓住“国难当头，废止內战”这个题目，于一九三二年五月間在上海策动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銀行公会、錢业公会四团体，发起一个“废止內战大同盟”，这个大同盟的章程十条，就是吳所起草；发表通电，署名者都是上海的“聞人”，工商界巨头多在其中，吳鼎昌也在其中。吳鼎昌策动发起这个“废止內战大同盟”，固然看准了人們願望和平害怕战争的心理，而在他个人却是“手揮五絃，目送飞鴻”，嘴里喊“废止內战”，眼睛却向蒋介石送秋波。他所起草的废止內战大同盟的十条章程，开宗明义便說：“鉴于外患內忧之严重，特发起废止內战大同盟，以期安內对外。”这个“安內对外”到蒋介石那里就变成“攘外必先安內”了。在这个大同盟成立以前，吳鼎昌于五月十七日在上海地方維持会发表演讲說：“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內战促其崩潰，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黃巢、张猷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出現于全国。”这显然是指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紅軍对蒋介石“剿共”的抵抗。六月九日吳又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废止內战大同盟”，并将讲稿在国聞周报上发表，宣传这个运动是由他策动、发起、組織起来的，以显示他在中国資产階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重大压力，蒋介石一方面需要比較有力量的报纸替他的不抵抗政策辯护，另一方面也需要搞些花样作为他准备抗日的点綴。为了前一种需要，蒋介石叫于右任給张季鸞打电报，要大公报主张“緩抗”，以应付全国各方面，特别是青年学生請願抗日的怒潮，大公报的确为此大卖了力气。为了后一种需要，蒋介石

石在南京政府之下組織了一個所謂“國防設計委員會”，網羅各方面的有名人士參加，以為點綴。在金融界方面，錢昌照給蔣介石開了個三人名單：吳鼎昌、徐新六和張嘉璈。在此以前，張季鸞曾經在蔣介石面前揄揚過吳鼎昌，蔣此刻為了需要，自然加以延攬。這年夏天，蔣約吳在牯嶺見面，連續談了一星期，對吳大為賞識。從此，吳鼎昌跨進了蔣介石政權的門檻。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不但牢牢穩占了東北四省，並且已經顯示它要向關內前進了，它要占領全中國。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了。蔣介石為了繼續欺騙人民，準備組織一個以他自己為行政院長的“名流內閣”，內定以吳鼎昌為實業部長。先於這年十月間，由吳鼎昌糾合平津滬漢金融工商界首腦人物，組織了一個“赴日經濟考察團”，到日本去搞所謂“中日經濟提携”。這個考察團一行共有三十四人，團長為吳鼎昌，團員有陳光甫、俞佐庭、周作民、黃文植、劉鴻生、徐新六、唐壽民、錢永銘、宋漢章、鄒敏初、鍾鐸、胡筠庵、黃江泉、南經庸、祝士剛等。從這個團的組織成員來看，吳鼎昌儼然已取得當時金融工商界領袖的地位。吳鼎昌從日本回國不久，即於這年十二月坐上南京政府實業部長的交椅。吳鼎昌同蔣介石政府的关系從此升堂入室了，這在吳鼎昌算是如願以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國民黨政府由南京撤退到武漢，吳鼎昌即轉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綏靖副主任。當他在貴州期間，閑暇時在貴陽花溪飲酒賦詩，有的時候穿着上將的戎裝向國民黨軍官和部隊“訓話”，是他作官很“寫意”而過癮的時候。一九四五年被調到重慶當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文官長，成了蔣的幕僚，他小心翼翼地伺候蔣介石。這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對日抗戰的歷史階段過去了，作為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

的蒋介石，他紧紧勾結着美国帝国主义，一面急着搶受降，以搶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一面加紧准备內战，以遂他灭共統一的野心。蒋介石原是坐待胜利的。一旦胜利突然到来，使他一切措手不及。他需要时间。搶夺胜利果实需要时间，准备反共內战更需要时间。吳鼎昌向蒋介石献策了，他要蒋介石装出一副和平姿态，邀請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計”。他預料毛主席不会到重庆去。如果毛主席不到重庆去，国民党可以借此宣传是共产党不願意談和平；如果毛主席去了，蒋介石也可以利用国共談判的时间搶受降，調兵遣将，准备內战。蒋介石採納了吳鼎昌这个計策，即令吳起草了一个“寒电”，于八月十四日拍往延安。吳于十五日晨把电稿交給大公报，要在当天的《大公晚报》上发表这个独占的大新聞。稿子发排后，被新聞检查所扣住了。該所請示“侍从室”，陈布雷說“絕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謠”。原来象这样的重要文电，向由陈布雷經手，而这次却由吳鼎昌献策并經手发出。結果这项新聞大公晚报未能搶先，而是由“中央社”統一发稿，十六日同見各报。毛主席于十六日答复了蒋介石的电报，朱德总司令同日也給蒋介石一个电报，向蒋介石政府提出六項严正要求^①。蒋介石又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两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美国駐重庆大使赫利还在八月二十七日为此到了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爭取和平，也为了在爭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結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毛主席等到了重庆，可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中国

① 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一四二頁。